

書同文

文化
經緯

始皇出，四海一。雖然秦皇朝短命，二世而亡，但秦始皇「書同文」政策，卻為中國統一奠定了千秋偉業的基石。

我自小在上海讀書，老師們都是江浙人，這些地方的鄉音相近，都聽得懂；電台、電影用的是「國語」（「普通話」），所以以為自己也能夠講「國語」。畢業分配到在瀋陽的東北工業部，第一次政治學習會上，表示積極，滔滔不絕地發了二十分鐘的言。散會後，科領導表揚我「大膽發言」；話音一轉，他說「可惜你講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六十五年前的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中國幅員廣袤，各地語音相異；幸虧「書同文」，才能組成統一的國家。

其後，我被調到各地，轉了一圈。回上海，已能講普通話；模仿東北口音，幾能亂真。一九八〇年為多掙點錢，業餘給一個夜校講課。臨上課前，打電話給已經在復旦教書的老同學，對方給我的第一句勸告是「上課一定要講普通話」。我這才注意到，上海的商店裡，正開始普及普通話，幫助消除與「外地人」之間的隔閡。雖然書同文，但口音不同，也必然產生隔閡。

地方口音也有特別的用途。我和老伴祖籍都是寧波，自小家裡聽得多，也會講一些。當只有我們兩人時，常常喜歡用寧波口音對白，「鄉音未改」，產生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而且，有一些細微的表情，不是普通話能表達的。當然，如果在座來自其他省市的，大家必用普通話；凡有一個老外，所有的人就都改用英語，以免那位洋人感到落寞。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移來者的語言總有幾十種吧。我初來美國時，曾寄居在一位百歲老太家中，她上代來自意大利。侍候她的管家，上代是德國人；管家嫁了個墨西哥人，也住在老太家。這樣，一幢房子裡有四種語言。有一次談到語言問題，老太正色地說，既然要移民這個國家，大家必須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國語」），那就是英語。美國開國元勳們有此灼見，在三百多年前，把統一語言列入法律；這使我更加佩服二千多年前中國古人「書同文」的遠見。

滿族侵佔中原，清皇朝佩服漢人的文化。科學取士、上朝議政，只用漢語。我有一個八旗子弟的老朋友，用漢姓、漢語基礎卓絕，是我所有中國朋友中唯一能按韻律寫詩詞的。三百年統治中原，滿族文化反而沉淪，現在已經沒有能操滿語的滿人了。但如果滿族先祖跟成吉思汗一樣，不接受中原的文化和語言，決不可能有三百多年的天下。

香港的歷史特殊，淪為英國殖民地達一個世紀之久。《基本法》規定普通話、粵語、英語為官方語言；我想這個過渡期間，越短越好，否則我們還不及秦始皇有遠見了。語言，對人們的心理傾向有重大影響，上海人抖落出一句「阿拉上海人」，是顯出藐視其他人群的情緒。我的老同學以「上課必須講普通話」相識，其含義遠不止於「使人聽懂」。廣東地方口音特殊，外人難以和他們交流，他們也必因此覺得自己是特殊人群。上海有個賣廣式熟食的「老大房」，七十年前我孩提時，知道在那裡買「義燒」時講一句粵語，售貨員就會多切給一刀。鄉音發抱團情緒也。二十年前，舊金山副總領事到我們這個小城訪問，華人聯誼會會長夥同我請他在一家台灣同胞開的餐館吃飯，席上那個有台獨信念的店主得意地說，「前天李登輝總統用台語演講」。華聯會主席顏君笑着接口：「不就是閩南話嗎」。可見，口音不同，會形成自外於他人的原由。顏君的「搶白」，一針見血——台灣的「鄉音」，正說明台灣人只是閩南人的後裔也。店主語塞塞。顏君不幸早逝，我一直記住他這段對話。

這幾天在報道「佔中」的電視中看到香港人都只會講粵語，回歸十七年來沒有變化。引起我重溫「書同文」思想的偉大和語言趨同的重要。

「錢能通神」這一段老話，中國人當不會陌生。細說起來，這可不是一句坊間閒話，而是源於唐人張固記敘的一段歷史事實。說的是中唐時期宰相張延賞，早就知道有一大案頗為枉屈，每每提及都扼腕嘆息。待到他兼管全國財稅收支時，就把負責此案的獄吏召來嚴加訓諭，並責令說，此案拖延得已很久了，十日必須結案。第二天來到府衙辦公時，發現桌上有一紙條：出錢三萬貫，求你不再過問此案。張延賞大怒，催促獄吏更加覆查力度。第三天，紙條又來了：出錢五萬貫。張延賞更加惱怒，命獄吏兩日結案。第四天，又發現一紙條：出錢十萬貫。張延賞嘆道，出錢至十萬貫，可以買通鬼神了，沒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惹禍上身，不得不此為止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張固所述「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據考證者比。」就是

上

曾經滄海

東西
走廊

紐約歷史協會博物館日前舉行了一場專題活動，為九十一歲高齡的哥倫比亞大學華裔教授周文中慶生。同時邀請了他的三位得意門生——譚盾、陳怡和周龍，以「從中國到美國的音樂歷程」為題展開討論。這三位音樂家都是通過周文中慧眼識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得到機會從中國來到美國，並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

說起譚盾，周文中回憶道：自己在一九八六年到北京參加音樂會，遠處一個年輕人一直對他使眼色，他便跟年輕人到外面談話，這年輕人向他毛遂自薦，那個年輕人就是譚盾。當時譚盾苦於學校教授不欣賞其過於前衛的音樂，「不像一般有人教授推薦信，我就用別的方式讓他入學。」旁人永遠不知道他下一步是什麼！周文中如此形容他的這位得意門生。這就是譚盾留給周文中教授的深刻印象。

大約在一九九四年我曾經拍過一部譚盾的紀錄片，那次我從舊金山打電話給紐約的音樂家譚盾，告訴他我想拍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作為我的碩士論文作品。對於我的想法，譚盾確實是有興趣的。我與他素不相識，我是輾轉多人從一個朋友那兒得到他的電話

譚盾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和一個舞蹈家合作的是紙樂《金瓶梅》。英文劇名的直譯是《粉紅色》。他們的創意是受到《金瓶梅》中性誘惑和壓抑的主題所啟發，借《金瓶梅》做一個載體，傳達自己的音樂、舞蹈理念。譚盾有感於紙在揮、吹、揉、捏、撕等不同的動作中發出的音響品質所產生的情緒感染差別，特地以紙樂為舞劇的貫穿。有一幕表現兩性關係糾葛的場景，一男二女在地面上舞蹈，兩大卷紙成十字形在他們上空波瀾起伏。噠噠的紙聲和場邊紙笛的尖哨淋漓盡致地渲染了淒婉的情緒。

演出結束後，我在劇場外對前去觀看表演的中國著名作曲家朱誠耳和英國BBC電台的總監作了採訪，他們都高度肯定了譚盾在音樂處理上的創意。

譚盾是個極靈活的人，一雙眼睛時常處於沉思狀態。在劇場大廳裡見到他，他理着小平頭，穿着白布褲和北京黑布鞋，他的裝束整潔，富有中國特色。他自信的眼神告訴我，在紐約這個世界裡，他不拘細節，活得自由自在。對譚盾的採訪是在他家簡樸的工作室裡，一邊陳列着他的陶樂器皿，另一邊一張簡單的書桌面窗而立。在這個窗前，他聽着紐約的市聲，在樂譜上寫他故鄉湖南的鄉音。

我的影片完成後，就聽到他應聘為英國BBC交響樂團的客席作曲和指揮，為此我還特地在片尾加了旁

忘情指揮時的譚盾

網上圖片



。譚盾說，原先電影導演陳凱歌在紐約時，曾經有過拍他記錄片的想法，後來經費不足沒有拍。去年英國BBC電視台以他在紐約博物館的陶樂演出為主，拍了一個專題。

我之所以想拍譚盾，是想選擇一個東西方結合的藝術實例。離國之前，我和譚盾同時代的留學生已經充分地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和浸染。如果我們能夠在屬於母語的中國文化和外語的西方文化中找到最佳的結合點，使兩者融會貫通，我們就不會在洋人面前妄自菲薄；也不會在變化萬千的世界面前故步自封，在這個基點上，譚盾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我提着攝像機離開紐約甘迺迪機場，進入市區時，已是華燈初上時分。紐約都市絢爛、嘈雜的夜生活盡情地展示出來，車潮、人潮如流。秋天的風帶着絲絲涼意拂面而來，街道兩旁隨處可見一些年代久遠的公寓建築。我有一種置身上海街頭的感覺。

當我走進外百老匯的劇場時，坦白說起初有些失望。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不是燈火輝煌的大劇院。外百老匯區的街道窄而舊，這是一個實驗劇場，兩道黑色的木門進去，上下兩層各有一個劇場，在這兒演出的大都是一些實驗性的藝術團體。觀眾的知識層次較高，都是慕名而來，紐約素以藝術家之都著稱，扔一塊石頭掉到地上，一定能打中一個藝術家，人們常這樣說。

白祝他好運。而伴隨那段旁白的就是他的作品，一陣陣時緩時急的鼓聲。他看到我的完成片是從英國回紐約的清晨，看完片子就興奮不已地打電話給我，把尚在睡夢中的我吵醒，我的影片後來在舊金山地區專以放映紀錄片為主的電視頻道黃金時段播出。許多藝術家、教授觀後打電話給我，從他們的觀感中，可以感受到，我在影片中闡釋的譚盾作品引起了他們很大的興趣。

譚盾從北京來到紐約，又從紐約走向世界。在參加這次活動的採訪中，譚盾回想起哥大求學日子，他記憶依然深刻的是周文中教授每月一次、每次四小時的中華哲學課及美學課，系統介紹從老莊、孔子思想到歷史、藝術史等，使他們深刻「認識到其實中華傳統文化跟世界是接軌的，而正因為我們沒有斷開與母體文化的連結，我們使得母體文化成為領引世界潮流的重要思潮。」

回想當年採訪譚盾時，在我面前，他始終表示出對自己的音樂實驗創作充滿了信心。他的一句話在我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也許這些年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太平，明天發生的許多事也許都不是我們嚮往的。雖然那個年頭，對於都是從中國出來，正在求學和異國奮鬥路上的年輕人，他所說的顯然具備更多的正能量。這句話中蘊含着自信，相信自己毫不鬆懈的努力奮鬥，必將迎來奇跡般的收穫。

將近二十年後，譚盾已經成為世界上重要的音樂家，在接受採訪時他終於坦誠地說出了當年奮鬥的不易。他說，一路上會遇到許多挑戰，甚至辱罵，維持基本生活的艱苦已非最掙扎的煎熬。一九九〇年一次他在古根漢博物館創作陶樂器的音樂，讓聽眾聽見泥土的聲音，一位教授當場批評他，「譚盾，你能不能弄點聲音是我們能跟你一起討論的，動不動就是中國的大地之聲，能不能講講不只是泥土的聲音？」譚盾坦誠，在各種質疑面前，有時他會動搖，「是否要去迎合美國大眾普及的思考，這種失落感很多」，也會在內心掙扎要成為「中國作曲家」或是「美國作曲家」，要摒棄中華文化、或是對美國文化不屑一顧。

確實如此，當時譚盾的音樂創作受到廣泛的批評，批評他的人說是開雜貨鋪。我拍攝的記錄片，在美國觀眾中獲得了毋庸置疑的好評和興趣。可是在國內朋友間交流時，獲得的質疑較多，我的一位知識界朋友看完後情緒激動地斥責譚盾的音樂創作是喧衆取寵。

好在譚盾的音樂涉獵很廣，他手裡掌握着幾把斧子，每一方面都運用嫻熟。他既創作實驗性的陶樂、水樂和紙樂。他也指揮古典的交響音樂，還活躍於電影音樂創作，在同一部作品中，他又喜歡新舊雜陳，他把傳統合唱團，邊緣音樂、主流音樂和自然音響揉和在一起，不分新舊、巨細，文雅與粗糙，東方和西方，提琴和琵琶，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民歌，毫無禁忌。難能可貴的是，這麼多年下來，他堅持住了，路也越走越寬。

我曾在不同的場合欣賞過他的不同類型的演出。除了在紐約拍攝他的紙樂，還在舊金山看過他的崑劇《牡丹亭》。還有一次由舊金山著名的小提琴四重奏組演奏他的作品。胡琴加入了與小提琴的對奏，還有一位老美在舞台上的一隻水盆裡不斷弄出不同的水的聲音，為弦樂的綿長滲透進自然的元素。他還演出了具有濃厚地域風情的《地圖》《新絲綢之路長安》。並把這些演出地點選在湘西鳳凰城和西安，採用實景呈現的方式表現。而通過這些獨特的呈現方式，譚盾也確確實實以他極具創意的方式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元素，時常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一直到後來他的原創音樂《卧虎藏龍》獲得電影奧斯卡獎，更讓他登上全世界矚目的焦點。而其實在《卧虎藏龍》中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鼓聲早已在他早期的音樂中反覆實踐。真的如譚盾每天都期待的：他實踐了很多年的許多音樂元素，到了一個不知道的明天，獲得了觀眾的注意和反響，奇跡真的發生了。

譚盾回憶到那時他在林肯中心的第一場音樂會，說起那段經歷，譚盾曾講過一個故事，剛到美國做留學生時，他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曾在地鐵站和街頭拉提琴謀生。紐約這座城市具備濃厚的街頭文化氛圍，隨處可見一些十分有才氣的街頭藝人在城市的街道上表演。那時譚盾常去的是林肯中心門外的街上。那時有一位黑人藝術家也常在那裡與他為鄰。那年譚盾終於有機會走進林肯中心去開音樂會了，在門口他又見到那位黑人兄弟，他仍在那裡堅守。看到譚盾走來，他熱情地迎上去說，好久不見你了，什麼時候再來拉琴？他所指的顯然是在門口拉琴賺錢。沒想到譚盾回答他，我是到裡面去開音樂會。當時這樣的成績對於一個移民音樂家是何等的榮耀，不過譚盾記得就是那次音樂會受到《紐約時報》批評。「《紐約時報》罵我把交響樂寫成二胡、胡琴的味道。可是，十年後《紐約時報》又把我評為全球十大音樂家之一，因為我拓寬新時代交響樂的聲音。」譚盾在《紐約時報》受到的兩次不同待遇，與他在林肯中心的不同經歷緊密相連。了解了他的故事，我更真切地理解他話中的期盼「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這種期盼只有不懈的奮鬥者才有資格去擁有的。

當年採訪譚盾時，他並沒有絲毫提及自己音樂探索的困惑和艱難，這麼多年過去了，當他成為一個世界上公認的著名音樂家後，他在感謝恩師時也袒露了自己多少年的真實心路歷程，其實每一個奮鬥者都經歷過不為人道的掙扎。這些年來華裔藝術家在世界舞台上可謂光芒盡顯，馬友友、李安、朗朗等都是優秀的移民，他們的藝術成就都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豐富了美國和世界的文化。同樣我們也都了解了他們每個人成功前的坎坷。這其中蘊含着對自己母國文化的自信，頑強堅韌的自我奮鬥精神，都是奠定他們在美國創造文化精品不可或缺的成功者的元素。

文史
叢譜

幾年前，「豆瓣」上有一篇文章《世間已無蘇東坡》（現在還能搜到）。確實如此。蘇東坡的《明月幾時有》和《大江東去》開歷史先河，今人無人能及。不僅如此，其秉性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林語堂先生說：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智能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在今天的官場上還有這樣的官員嗎？我敢說，世間真的已經沒有了。

說蘇東坡世間已無沒錯，但想到蘇東坡的「政敵」王安石，我以為世間也已經沒有了。但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把王安石稱作「王安石那群小人」，似乎是錯怪了王安石，也堪稱古奇冤冤。

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也就是「文字獄」。蘇東坡在《湖州謝表》中雖然有不合時宜的言辭，但也沒有政治問題，而被抓「小辯子」，完全是小人「包藏禍心」故意要整蘇東坡。「烏台詩案」的製造者根本不是王安石，但歷史上卻把「功績」歸於王安石。原因就是，「烏台詩案」的真正製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曾是王安石在位時的「朋黨」。這完全是「株連」！難道兒子犯法，老子也有罪嗎？況且還有一證據證明「烏台詩案」與王安石沒有一點關係。

蘇東坡遭遇「烏台詩案」，雖然大家明知是「冤獄」，但也沒有官員敢諫言。然而，除了蘇軾的弟弟蘇軾外，王安石是唯一一個為蘇東坡求情的人。當時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落敗，當政的司馬光要「窮追不捨」，是蘇東坡為王安石說了好話：王安石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不能「趕盡殺絕」。王安石剛剛「安全」就等到了「投桃報李」的機會。王安石已被罷相，成了說話不管用的一介草民，但王安石不願看見一個天才詩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走上斷頭台。蘇東坡免了頭上的一刀，與王安石的激勵一諫有很重大的關係。

按理說，蘇東坡應該好好感謝王安石，但我們沒有看到蘇東坡的感謝言辭，大概是大恩不言謝吧。然而，王安石敢以平民身份諫言的勇氣和精神令人敬佩，如果換了今人，哪個官員願意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甚至危及仕途的事情呢？但王安石就敢做，而且預想的一樣，王安石因此繼續受到司馬光的迫害。而蘇東坡呢？王安石死後，蘇東坡在《制詞》中文字飛揚，但卻不忘羅列王安石的罪狀：「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傾陷善良；其為奸惡，未意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沒有今天把罪過一筆勾銷的悼詞一點味道。

說，張固的記敘並非憑空虛構，有一定的可信度。故實中提到的張延賞任要職，也不是一個貪財的昏官，其政聲朝野皆有定論。他之所以不接受「錢能通神」這一俗諺所隱含的魔鬼定律，是因為「出錢十萬貫」者絕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其背後必然交織着複雜的社會背景，憑張延賞單槍匹馬與其鬥法，殊無勝算不說，弄不好反誤了卿卿性命，終究於事無補。

《紅樓夢》中提到的護官符之所以那麼「神奇」，道理正在於此。

這就告訴我們：行賄不單是個金錢問題，行賄的背後必然包藏有利益最大化的禍心。不管行賄的價碼有多高，但對行賄者或行賄者背後的利益共同體來說，絕不會是虧本的投資，他們總是會以必要的成本賺取更大的利益。中國古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貪官，除了封建制度固有弊病這根本原因外，送禮行賄成風無疑是催生和豢養貪官的客觀原因。

即便在今天看來，行賄的禍患同樣不可低估。

年前新華網公開發布的一篇新華時評認為

，行賄成本低也是當下我國腐敗案件高發的原因之一。行賄者往往期望通過賄賂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犯罪成本很低，一定會促使行賄者铤而走險。分析已發生的案件會發現，一些行賄者並非行賄一個部門或者一次行賄，而是累犯，因為這些行賄者覺得，即使東窗事發，與獲得的巨額利潤相比，這種犯罪是值得的。另據公報報道說，在劉鐵男一案中，向劉鐵男父子行賄的至少有三大利益集團，他們所以孝敬劉鐵男及其家人、親信，是為了在鉛礦這塊富礦中獲取更大的份額和更多的利潤，可是涉及劉鐵男一案的多家企業負責人，目前基本「安然無恙」。

行賄與受賄是政風腐敗得以成立的兩個共同要素。查辦受賄貪官固然重要，但若對行賄者網開一面，仍然難以遏制官場賄賂風不止的積弊。因此，在查處受賄案的同時，應將行賄者及其利益共同體綁定該案一併查處。香港特區對行賄行為不設起刑點，只要是行賄，不論多寡，都判定為犯罪。

這段文字其實是對「錢能通神」的一個反駁。

說，張固所述「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據考證者比。」就是

說，張固所述「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據考證者比。